

朱希祖史学史选集

朱渊清 编



中西书局



朱希祖

史学史选集

朱渊清 编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希祖史学史选集 / 朱渊清编. —上海: 中西书局, 2019.6

ISBN 978-7-5475-1585-3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史学史—中国—文集
IV. ①K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0482 号

朱希祖史学史选集

朱渊清 编

责任编辑 邓益明

装帧设计 黄 骏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書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邮编 200040)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84 000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585-3 / K·299

定 价 8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 021-64709947

目 录

朱希祖及其史学史研究	朱渊清 / 1
《穆天子传》辑校举例	夏含夷 / 49
从校勘学到历史学	朱渊清 / 75
汲冢书考	97
《晋书·束皙传》汲冢书目中《周书》考	142
臣瓚姓氏考	145
中国史学之起源	153
中国史学之派别	169
太史公解	196
史官名称议	204
汉十二世著纪考	210
汉唐宋起居注考	220
萧梁旧史考	230
十六国旧史考	258
蜀王本纪考	269
西夏史籍考	274
驳《史通》元魏著作局及修史局说	282
驳《宋书》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说	284
史阁考	285

南明三朝史官及官修史籍考 286

永历大狱十八先生史料评 289

清内阁所收明天启崇祯档案清折跋..... 309

朱希祖及其史学史研究

朱渊清

朱希祖是中国近现代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位历史学家,他不仅有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和综合史观,而且有大量科学实证的研究成果;不仅做历史研究,还规划中国历史学科和历史教育,组织研究学会,并且对国史编纂、档案整理、地方史志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朱希祖亲身经历并先导着中国史学从经世致用到社会史观追求普遍真理,再到科学实证研究的整个现代化历程。朱希祖开创了中国史学史学科,他的《汲冢书考》是迄今为止中国史学史最重要的一项研究成果。

一

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亦作遑先、迪先,浙江海盐人。1905年,朱希祖考取浙江官费留学生,同年7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历史。其间,与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等人一起从章太炎学。1909年毕业归国。1913年,受北京大学预科学长胡仁源聘为预科教授。1920年夏,蔡元培推荐朱希祖继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领导北大史学系转型成为现代学术体系的历史学系。1929年,朱希祖被推举为中国史学会主席。1932年,赴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史学研究所主任,并兼任《广东通志》纂修。1934年,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1937年迁到重庆。1940年,任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后改总干事。1944年7月5日,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为之举行公祭。

朱希祖著述宏富,范围广阔。罗香林《朱逖先先生著作目录》将他的著作分为16类,^①其中史学理论2种,史迹发现2种,史料辑录3种,史学考证5种,版本目录5种,战国史2种,萧梁史3种,唐史2种,宋史3种,明史4种,近百年史2种,家史2种,文学史2种,小学与经解2种,日记随笔1种,诗文集2种。他的重要作品,有《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东西周君年表》、《西周君世系考》、《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战国史年表》、《战国史丛考》、《战国地理杂考》、《太史公解》、《桑弘羊之经济政策附年表》、《汲冢书考》、《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六朝都城考》、《梁代货币考》、《萧梁史丛考》、《唐代西南地理研究》、《雪山党项地理考》、《驳李唐为胡姓说》、《吐蕃种族考》、《云南濮族考》、《宣和博古图考》、《安州古器图考》、《杨么事迹考证》、《伪齐录校证》、《伪楚录辑补》、《宋代官私书目考》、《赵明诚年谱》、《明成祖生母记疑辨》、《明季史籍题跋》、《南明人碑传集录》、《屈翁山年谱》、《屈大均传》、《明广东东林党列传》、《南明人物事迹考》、《整理升平署档案记》、《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中国文学史辑要》、《中国文字学》等等。朱希祖还主持修撰《广东通志》,参与《清史稿》修撰并担任《清史稿》审查主任。

二

朱希祖少时读经,考秀才举廪生。在日本学习历史学期间,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和音韵学。清末民初学术,章太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为正统派大张其军”。^②章太炎在京师、日本讲学,从学者众,终于占据京师学术要津。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文史两系,多

① 罗香林:《朱逖先先生著作目录》,《文史杂志》1945年第5卷纪念专号;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附录,庄严出版社,1977年。又,罗香林辑录、朱僊增补、朱元曙续补的《海盐朱逖先先生著述总目》分为18类,见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25—449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86页。

是蔡元培引入的浙人,大多出章太炎门下。^①清代两浙学术或以顾炎武、黄宗羲分派,顾炎武代表浙西学术,黄宗羲代表浙东学术。浙西、浙东其实非以地域分派,浙西学术精绝考据,浙东学术史理贯通。清未经学地位的不可遏止的衰退、积贫积弱的民族危亡的现实,使经世致用的史学成为民族复兴的资源与希望。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曰:“承平之世,儒家固为重要;一至乱世,则史家更为有用。”章太炎在清末民初,高举民族主义文化大旗,被认为是浙东史学的传人。

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曰:“吾浙江自明清以来,史学最为海内所尊崇,不特宋濂、万斯同之修元明史,固已彰著人之耳目,即明之郑晓、朱国桢、黄宗羲、谈迁、张岱、查继佐,清之温睿临、邵廷采、邵晋涵、吴任臣、全祖望、章学诚诸公,亦皆有伟大之著述,先师承先启后,更拓大其疆宇。”^②明清浙东史学向有经世的传统,自命传浙东史学的朱希祖著《伪齐录校证》、《伪楚录辑补》,以及他的南明史研究都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情怀和民族气节,是经世致用之学。朱希祖回忆章太炎史学:“先师治史,以《春秋》为始,以《明史》为终。明亡于建夷,《春秋》攘夷之旨,先师自少年时已实行之,被捕下狱,在所不辞,卒能以言论左右人心,佐成革命大业。……生平尝以顾亭林、王船山为私淑,申其春秋大义于天壤,此正其得力于史学大端也。”^③朱希祖自己说:“希祖生平亦最嗜史学,与先师平日谈论亦以史学为多。”^④章太炎戏封弟子太平天国五王,朱希祖为西王。章太炎评价“逃先博览,能知条理”。朱希祖1939年12月7日日记引章太炎《自订年谱》:“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后改名玄同,名字合一),海盐朱希祖逃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逃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⑤

①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② 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文史杂志》1945年第5卷纪念专号,又见《朱希祖文存》。

③ 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见《朱希祖文存》。

④ 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见《朱希祖文存》。

⑤ 《朱希祖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第1126—1127页。

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传入,史学的社会职能更被提升到国家与种族(文化)存亡的高度。传统旧史学被激烈批判。严复痛斥传统中国史学一治一乱的循环论,黄遵宪驳斥天朝为中心的历史观,徐仁铸批正史为十七姓之家谱,唐才常斥传统史家以取悦帝王为目的。进入20世纪,在外患的强大压力下,史学致用的理念得到强调;中国史学正是因为被理解为经世致用之学而开始了其“新史学”的历程。梁启超《新史学》说:“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把史学看成是明掌故得失、通晓世变的学问,而认为与西学同具致用性的功能。

史学承担经世致用之责,也是因为时人所认知的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教中国史的陈黻宸在《中国史讲义》中说:“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因为史学是“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成立”,“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陈黻宸的讲义中,“读史总论”、“政治之原理”、“社会之原理”占了三分之一。在陈看来,因为史学是凡事凡理所从出,如果掌握了政治社会的原理,“于史学思过半矣”。

20世纪初,在19世纪后半期西方用进化论解释社会变迁和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梁启超、严复等人都相信进化论就是宇宙间的根本定理和普遍规律。1901年,梁启超作《中国史叙论》,1902年,梁又发表《新史学》,开创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经世致用的新史学,提倡以社会进化学说来解释历史,梁启超认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一大批社会学著作尤其是社会进化理论方面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1903年,马君武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吴建常从日文本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等。还有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日本学者的著作被留日学生翻

译。社会进化理论强调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有力地挑战了传统史观。五四运动之前,大量的社会进化历史理论来自日本。汪荣宝根据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和久米邦武、浮田和民等人的论著,编译有《史学概论》,在《译书汇编》第九期发表;1903年,浮田和民所著《史学原论》有李浩生等六种译本在杭州、上海等地出版。随着社会进化理论的广泛传播,经世致用的历史学被许多新型的知识界人士认同为能够求得人类社会进化规律,并因此可以预言人类社会前景的社会科学。新历史学替代经学而兴起,承担了经世社会之责,所以它在中国社会进化的信念鼓舞下走上社会科学的轨道可以说也是必然。两千年来习惯于天命论历史认知的国人,显然更易于接受社会发展规律的整体历史观;而社会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另一个重要基础是处于民族文化存亡之际民族主义的盛行。

在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浙东史学的熏陶影响下,并接受日本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教育,朱希祖积极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转向。

朱希祖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学科目标设置和历史学系课程规划作出了最大的贡献。1917年蔡元培掌北京大学。1918年10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对傅斯年《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有一个“附识”,记录了蔡元培对历史学方向的设想,“史学皆用科学的研究法”。1919年下半年,北大在蔡元培领导下进行改革。北京大学在1917年以前,并没有史学系,1917年秋,才开始从中国文学门中分出一部分教员,加上国史编纂处的一部分编纂员,组成了中国史学门。五四运动后,康宝忠担任中国史学门主任,添加西洋史各科,改为史学系。“于是始有一国的史学,而改为世界的史学,此为史学系第一次改革。”^①但是当时的史学系课程,都是专门史事的研究,“而无社会科学等科目,以为史学基本科学也”^②。朱希祖是北大的老人,^③1920年夏,在蔡元培力荐之下,朱希祖出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开始对北大史学课程作全

①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又见《朱希祖文存》,第329页。

②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

③ 周作人:《红楼内外》,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第391页。

新的课程设计和规划。“思以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此为史学系第二次之改革。”^①朱希祖执掌的北大史学系之后还有“第三次改革”,就是“由普通史的灌注进而为专门史的研究”^②。朱希祖自己回顾北大史学系的三次改革:1. 由一国的史学而世界的史学;2. 由文学的史学而科学的史学;3. 由普通史的灌注而专门史的研究。如果说第一次改革只是扩大北大史学的堂庑,中国史再加上世界各国历史,那么,后两次改革都对史学的研究方式、研究目标有了重大的变动,第二次是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第三次则是史学的专门化。

对于北大史学系的社会科学化转向,朱希祖秉持这样的理念:“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③他说鲁滨逊(J. H. Robinson)的《新史学》,“其中尤以‘应该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去试验他们一下’这句话最简括切实”^④。朱希祖说他“读了这几句话,差幸对于北京大学校史学系的课程,改革得尚不算错”^⑤。朱希祖确定:“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列于必修课。”^⑥对于自己改革北大课程,朱希祖说:“我那时就把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大加更改。本科第一、二年级,先把社会科学学习,作为一种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特别注重的,就推社会心理学。”^⑦

1904年张之洞进呈《奏定大学堂章程》,依据日本学制,为尚未筹办的文学科大学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制定详细科目。与朱希祖的史学教学和课程设计相比,两者之间已有质的差别。在教学体系上,朱希祖以欧美新史

①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

②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

③ 朱希祖:《新史学·序》,何炳松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又见《朱希祖文存》,第376页。

④ 朱希祖:《新史学·序》,《朱希祖文存》,第376页。

⑤ 朱希祖:《新史学·序》,《朱希祖文存》,第376页。

⑥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

⑦ 朱希祖:《新史学·序》,《朱希祖文存》,第375页。

学思想为指导,规划史学系课程;在课程设置上,他重视史学理论课的建设,视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为“最重要之学科”;在教学方式上,他主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研究能力;在师资方面,他广揽人才,延聘很多新式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张星烺等众多史家都曾被请来上课。1921年,北大第一届史学系学生毕业。朱希祖得到蔡元培同意后,选派本系毕业生姚从吾去德国学历史,选派理科毕业生毛之水的去德国学地理学。

朱希祖希望“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曾聘西洋史教授翻译新史学及唯物史观等书”。^①朱希祖请何炳松、李大钊、陈翰笙、李璜、陈衡哲等来北大史学系上课。1917年,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历史和政治学归来的何炳松开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教材。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倡导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综合研究,用进化观点考察历史变化,强调人类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成长过程,并且认为史学的功能是了解现实和预测未来。1921年2月,在朱希祖的催促下,在北高师学生江兴若,后来又在傅东华的协助下,何炳松开始翻译《新史学》,到8月译毕。这对当时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希祖为何炳松译鲁滨逊《新史学》写序说:“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学科。”^②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刘师培以及李大钊等人的介绍进入中国。李大钊1913年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学,1916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等文章,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李大钊以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于,认为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为经济

①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

② 朱希祖:《新史学·序》,《朱希祖文存》,第376页。

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拒性的。1920 年秋,刚出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聘请早稻田大学的学弟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课程,同时李大钊还在北大史学系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李大钊的这些课程在北大影响极大。

北大史学的课程设置后来成为民国教育部颁标准的基础。1938 年 2 月,陈立夫接任教育部长后,积极推动大学课程改进计划。教育部征求大学课程标准意见,聘请朱希祖拟定大学史学系课程标准,并由蒋廷黻、雷海宗、徐则陵等负责审查、修订。朱希祖《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审查意见》清晰指出:历史学系不外应用与学理二途。大学教育,以学理为重,以期发明;其应用则师范院校任之。而就学理言之,则目的有二。一则发明历史真相,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为必修科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语言诸学,及人文地理、吾国文字学、古文书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日、俄等国史为选修科,或更以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辅之。二则发明历史真理,则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外,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科,或更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辅之。至如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内容多有相通者,用其一种足矣。^①

三

朱希祖是社会进化论者,他相信,人类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北大史学会成立,朱希祖讲演希望学生“研究人类全部的历史”,“不宜把空间分割”,因为“必须总汇统观,普遍研究,方可以看出人类怎样的进步”。^② 朱希祖批评章学诚的“经世”理论,更加以现代的阐释:“盖人之经世,必先洞明时局,而

① 朱希祖:《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审查意见》,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朱希祖手稿,又见《朱希祖文存》,第 336 页。

② 《朱邇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北京大学日刊》1922 年 11 月 24 日。

今之时局,非一朝一夕所成,皆由历史递演而来,此历史成立之原理也。”^①朱希祖比较了先秦诸子的历史观,认为儒家、道家等都是主张历史退化的,只有法家“抱着历史进化的观念,绝对的反对复古”。法家的历史观念要“比儒家和道家的历史观念好得多”,“应当拿法家的观念去读历史”,要“秉着历史进化的观念,创造一种将来的理想的世界,一种前所没有的、与现在不同的世界”。^②朱希祖赞赏法家的社会进步主张,并且把这种历史认知变成现实社会的革命,他自己也积极投身鼓吹新文化运动,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朱希祖《研究孔子之文艺思想及其影响》,中曰:“幸亏他们,总算把封建制度打破了。建设了郡县制度。若从儒家,一定要保守封建的古风。现在的一班法家,也总算打破了君主制度,建设了共和制度。若从儒家,一定要保守君主的古风。”^③

学术上,朱希祖强调以科学方法整理古籍,“要阐明他进化的迹,发现他变迁的理”^④。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是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开创性著作,“又以科学方法治史,视人类之发展,与动植物之发展相同”^⑤,有着当时普遍的粗率线条和简单比附的社会进化论和文化进化论的鲜明特色。比如分析中国史书的源流,认为中国史学的产生“有两元之倾向”,“即所谓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也,取自然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谱学,取理想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英雄诗”^⑥,“谱学进而为年代记(吾国称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为纪传”,中国史学按照“诗最先,纪传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纪最后”的

① 朱希祖:《文史通义札记·序》,《史地丛刊》第1卷第3期,1922年。

② 朱希祖:《中国法家的历史观念》,《朱希祖文存》,第188页。

③ 朱希祖:《研究孔子之文艺思想及其影响》,《朱希祖文存》,第66页。

④ 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3号,1919年;又见《朱希祖文存》,第87页。

⑤ 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自序》,《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4年;又见《朱希祖文存》,第373页。

⑥ 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第18页;又见《朱希祖文存》,第108页。

顺序发展。^①

史学分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两元”，“谱学进而为年代记（吾国称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为纪传”，这是应用了德国史学家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的分类和观念。李大钊在他的《史学要论》中也同样应用了兰普雷希特的这个“两元分类”和进化说法。

哲学上可归属于黑格尔主义的朱希祖，最推崇德国兰普雷希特文化史学的综合史观。朱希祖最早是在日本留学时还是在北大教书时接触到兰普雷希特无从查考。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朱希祖声气相投，蔡是兰普雷希特的弟子。蔡元培 1908 年至 1911 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时，听过兰普雷希特包括《德国文明史》、《史学方法》在内的很多门课程，并且在 1912 年应兰普雷希特邀请再度赴莱比锡大学学习。^② 朱希祖说：“民国九年的夏天，我担任北京大学校史学系的主任，那时我看了德国 Lamprecht 的《近代历史学》。他的最要紧的话就是：‘近代的历史学，是社会心理学的学问，现在历史学新旧的论争，就是研究历史，本于社会心的要素？还是本于个人心的要素？稍严密一点说起来，就是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在全体社会呢？还是在少数英雄？’Lamprecht 的意思，以为历史进程的原动力，自然在全体社会；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心的要素。”^③一直到晚年，朱希祖还常常读黑格尔和兰普雷希特的书。1938 年 10 月 14 日朱希祖致女婿罗香林信：“余近来阅译本德国郎泊雷希脱《历史学》及黑格尔《历史哲学》，深感治历史必须从社会科学入手，且最初须从心理学入手，以历史为人类心理过程也。余辈向治历史，仅为断片的考证，用力多而收获少，若仅少数人为之犹尚可也，驱全国学子出于一途，于社会实际进化无甚影响，此实大谬。”^④

兰普雷希特认定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在于全体社会，主张历史学应该研

① 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第 21 页；又见《朱希祖文存》，第 110 页。

② 张晶萍：《20 世纪上半叶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学理论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③ 朱希祖：《新史学·序》，《朱希祖文存》，第 375 页。

④ 《朱希祖书信集》，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02 页。

究包括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人类活动,必须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综合研究民族的文明历史。1924年,陈训慈《史学蠡测》也向中国学界介绍兰普雷希特的史学:“……以为史事演进之状态,断非一单独原因所能解释,必也就其时之群体心理中求其解,方能说明某时代之史迹。此种社会的心理,虽受各方面之影响(如地理、经济、政治),但既汇融众源,发之于事,则史事演进之主原,自在群心。”^①兰普雷希特借鉴新心理学学派理论,强调心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与之前各学派以个人心理来解说历史事件的做法不同,他把集体心理视为理解历史发展的关键。这一点,与以经济为社会基础的唯物主义史学有区别。朱希祖非常重视历史中的经济研究,他自己也从事经济史、钱币史的研究。受兰普雷希特影响,朱希祖特别关注心理学,他不仅大量阅读心理学著作,在广州时还托人找寻高觉敷。1938年10月14日朱希祖致罗香林信:“余近阅心理书多种,最喜读高觉敷《现代心理学》及其所译诸书,而《现代心理学》中有《现代德国文化科学的心理学》一篇,与治历史尤有关系,惜此种心理学尚无译本。今高君闻在广州襄勤大学为教授,乞代为一访,深致敬意。高君于心理学造诣极深,将来深愿与之交友,以便领教。余将来思欲转移中国历史学风,故先治心理学,继治社会科学,然后用以治历史,必于史学别开生面,若仍沿旧习治史,虽略有所得,于人类所补实少,此余所以欲提倡新史学及新文学也。”^②

1891—1895年,兰普雷希特以每年一卷的速度,连续出版了预计总12卷的《德意志史》的1—5卷,引起德国史学界的轰动,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方法之争”(Methodenstreit)。兰普雷希特关注的不是国家和伟大人物等个体的历史,而是德意志民族群体的历史,他想作一次“认真的尝试,揭示德意志历史内部物质的和精神的发展力量的相互作用,证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全面发展是有统一的根基并且呈现出若干进步阶段的”^③。兰普雷希特综

① 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1、2合期,1924年。

② 朱希祖1938年10月14日致罗香林信。《朱希祖书信集》,第202页。

③ 兰普雷希特《德意志史》的出版发行辞,转引自柏悦《“兰普莱希特争论”初探》,《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

合经济、政治、道德和艺术等诸多因素,从总体史角度出发,把德国历史当作一个分析阶段、合乎规律地逐步发展的进程来论述。兰普雷希特倡导的“新史学”对当时德国占据史学主导地位的兰克史学和政治的历史编纂的写史方法提出了挑战。兰克(Leopold von Ranke)在《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的历史,1494—1514》序中说:“有人以为史学的任务是要评论过去,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训示现在。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而已。”1896年1月,兰普雷希特出版《历史科学中的新旧流派》,声称要想真正了解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世界,政治史、经济史抑或个人英雄史都无能为力,只有文化史堪胜此任。^①在这个小册子中,兰普雷希特把他的文化史观说成是与“陈旧的”兰克传统相对立的“现代的、真正科学的”历史编纂发展方向。1897年,兰普雷希特又发表《什么是文化史?经验历史学刍议》,进一步论述他的文化史观,他提出集体主义力量与个人主义力量相对立,宣称社会群体心理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心理学是历史科学的基础。仅仅依靠史料批判方法不足以发现历史真相,只有借助因果规律(也称作“理性因果方法”或“集体主义方法”)才能将历史科学提升到与自然科学的科学概念相对应的科学的高度。^②

1940年,朱谦之介绍现代史学运动中这场很大的史学论争,称之为兰克的“考古派”与兰普雷希特的“考今派”的论争,并说:“而其结果,却是考今派的莫大胜利,使我们知道历史为一种理解人类文化的现在的一种实证科学。”^③兰普雷希特的“新史学”后来影响到美国的“新文化史”,并且对法国年鉴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布洛赫(Marc Bloch)都尊奉兰普雷希特为自己学说的先驱。^④不仅仅是长时段总体史,布洛赫的《国王神迹》和费弗尔的《16世纪的无信仰问题》还都是集体心态史的研究。但是,19世纪末发生在德国史学界的这场方法之争,兰普雷希特几乎是单枪

① 兰普雷希特:《历史科学中的新旧流派》,转引自《“兰普莱希特争论”初探》。

② 兰普雷希特:《什么是文化史?经验历史学刍议》,转引自《“兰普莱希特争论”初探》。

③ 朱谦之:《考今》,《现代史学》第5卷第1期,1940年。

④ 柏悦:《“兰普莱希特争论”初探》。